

## 经历的风雨

照片	文字说明
	<p>被拆毁的海珠炮台，1858 年。 布兰杰摄</p> <p>在广州城南离岸不远的珠江中有一块突出水面的礁石，称海珠石，清顺治四年(1647)在其上修筑炮台。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这座炮台受损，虽很快重建，但 1858 年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又拆毁了这座炮台，即照片中的情景，直至 1888 年才再次重建。</p> <p>进入民国后，这里一直为军警办公之所，1920 年代改为公园。其后广州于 1931 年扩筑新堤，海珠石由此成为现今广州沿江路的一部分。</p> <p>(参考编号：GC14.S.13)</p>
	<p>被英军抓获的两广总督叶名琛，1858 年。</p> <p>英、法两国分别于 1842 年及 1844 年通过逼使清政府与其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及《黄埔条约》，而在中国取得各种权益。但两国不满足于此，其后仍想扩大其在华的权益而欲修约，为清政府拒绝，于是两国以不同的借口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p> <p>英法联军在 1857 年进攻广州，当时处于战争最前线的地方官——两广总督叶名琛既没有组织有效的军事防御，也没有进行有效的军事进攻，并采取「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态度，更误判当时的形势，最后导致广州于 1857 年底失守。</p> <p>1858 年，英军将抓获的叶名琛送至印度软禁，相片所示为已被抓获的叶名琛。这期间他拒绝吃英国人提供的食物，在吃完自带的食物后，于 1859 年绝食而死。</p> <p>(参考编号：1072-PAG107.S.1)</p>



柏贵与巴夏礼会谈，1859 年。

罗西耶摄

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清政府罢免了叶名琛的两广总督职位，由原广东巡抚柏贵署任。看似清政府仍然维持了对广州的管辖，但实际上柏贵每一条政令的发布都受到以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为首的三人委员会审查，以柏贵为首的广州衙门成为受联军控制的傀儡政权。照片中是正在交谈的柏贵(左)与巴夏礼(右)。

(参考编号：SC7.38)



香港维多利亚港，1860 年。

比托摄

相片为英军随军摄影师比托于 1860 年在香港停留，等待北上时摄。相片可见海港内满布战船，为英法联军向中国发动新一轮攻势作准备。

(参考编号：AC1.34)



大沽南炮台向北望全景，1860 年。

比托摄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清军与英法联军于 1858 年、1859 年及 1860 年在大沽口进行了三次大战，清军只于第二次战役中获胜。

清军在 1858 年第一次大沽口战役失利后，由主持海防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对大沽口的布防进行了重新安排，不仅修复了之前受损的炮台，还增设了新炮台。从这张照片就能看出清军在河口中阻拦登陆的布置：尖桩、壕沟、树枝间隔排列。

(参考编号：AC1.13)



被英军用作指挥部的北塘炮台，1860年。  
比托摄

虽然在1860年8月第三次大沽口战役之前清军加强了防守，但却将其北边北塘炮台的守军撤走，导致英法联军从背面击破了清军的阵地。英军占领北塘炮台后，将其置为临时指挥所，从照片中丢弃的辎重装备看得出这次清兵撤离非常匆忙。

(参考编号：AC1.1)



被占领的大沽北炮台内部，1860年。  
比托摄

大沽北炮台刚沦陷于联军之手，摄影师比托就去现场拍摄了照片。彼时战场尚未清理，地上满布的清军尸体展现了当时战斗的惨烈。从散落的清军武器来看，抬枪、弩、腰刀等都很难以成为英法联军当时装备的燧发枪的对手。但尽管在武器和战术上清军居下风，这些守台官兵还是战斗到最后一刻。

(参考编号：AC1.8)



被占领的大沽北炮台外部，1860年。  
比托摄

从照片显示，清军在炮台外围的防御组合是深壕和尖桩，在战术上这是为了拖缓敌人前进的速度，但最终联军还是突破到了炮台下，并通过云梯进入了炮台内部。

(参考编号：AC1.5)



调头的大炮，1860年。  
比托摄

经过八里桥战役之后，清军的精锐部队已折损殆尽，英法联军一路抵达北京都没有受到阻拦。在兵临北京之前，咸丰皇帝等人离开北京，往热河「北狩」，留下恭亲王奕訢负责与联军交涉。英法联军劫掠并烧毁了圆明园，占领了北京城，并调转城墙上大炮的炮口指向城内，正如相片所示那样。

(参考编号：AC1.17)



法军缴获的清军大炮，1860 年。

杜宾摄

清军从北塘炮台撤走，匆忙间留下了大量辎重。从这张照片可以看出法军在北塘炮台缴获了很多清军火炮。

此相片为法国军队的杜宾上校所拍。他于第二次鸦片战争随军队来华时，在上海、烟台、天津、通州和北京都拍了立体照片。杜宾也参与了英法联军对圆明园的掠夺。

(参考编号：SC4.4)



北京的高庙，1860 年代。

摩尔摄

高庙是北京普济寺的俗称。这座小庙因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曾软禁过巴夏礼而被历史记载。会说中文的巴夏礼于 1860 年 9 月代表英法联军去通州谈判，被清军抓获，清军希望能通过他逼使联军退兵，将其关进大牢。当联军逼近北京时，巴夏礼被送至高庙休养，恭亲王奕訢希望他写信给英军讲和撤兵。巴夏礼最终在 1860 年 10 月 8 日被释放，几天后联军攻入北京。

(参考编号：AC7.A.31)



圆明园大水法遗迹，1870 年代。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在圆明园内大肆抢掠并焚烧此皇家园林，使其变成废墟。此为圆明园的大水法遗迹。

圆明园西洋楼的最大特色是水法，即喷泉，其中规模最大的喷泉就是照片中位于远瀛观前的大水法。在背景中石门的前面，原有一座大型的狮头注水口，向下形成七层水帘。最下方是海棠形喷水池，池中心有一只铜梅花鹿，有八道水柱从鹿角喷出；周围有十只铜猎狗，口中喷出的水柱直射鹿身，俗称「猎狗逐鹿」。如今这里仅余的几根石柱被作为圆明园的标志图案。

(参考编号：GC34.S.10)



圆明园西洋楼养雀笼，1870 年代。

查尔德摄

顾名思义，养雀笼是饲养飞禽的地方。在照片所示的门洞后两侧原有铜网编织的巨大笼子，饲养着各地进贡的珍禽。这座建筑的形制中西合璧，其西立面是中式柱廊的样子，而东立面则是有个石龛的西式门洞，如今只能通过地基的石块才能看出来这里曾经有一座建筑。

(参考编号：AC56.33)



圆明园谐奇趣，1877 年。

查尔德摄

圆明园谐奇趣是西洋楼园区内第一座完成的水法建筑。主楼的南面原有一座面积很大的海棠形喷水池，池内设有铜羊、铜鸭和翻尾石鱼等组成的喷泉。主楼两端有弧形的长廊分别连接一座两层的建筑，用作乐队演奏时的场地。

(参考编号：1113-PEK27.S.1)



圆明园远瀛观残迹，1870 年代。

查尔德摄

据说远瀛观曾被乾隆皇帝指定给他宠爱的容妃居住，为她配备了西式的金属床和浴缸，以及西洋玩具和装饰品。门窗的玻璃上绘有西洋人物及风景画。不过这一切在 1860 年英法联军施放的大火后都不复存在了，如今只剩下几根石柱孤零零地立在那里。

(参考编号：AC56.34)



圆明园方外观残迹，1870 年代。

摩尔摄

据说方外观是为乾隆皇帝宠爱的容妃作礼拜而建。从这张照片可见圆明园被英法联军劫掠焚烧后十余年，建筑的主体基本完好，甚至屋顶也基本完整。但此后数十年不断的拆毁于今天只剩下地基，比如观前的这座石桥后来便被移往北京大学未名湖。

(参考编号：GC22.S.15)



圆明园廓然大公，1879 年。  
香港华芳照相馆

廓然大公是极少数在 1860 年英法联军施放的大火中幸存下来的圆明园中式建筑群。相比西洋楼，砖木结构的廓然大公能保存下来简直就是奇迹。遗憾的是在日后不断的破坏中，除了假山的遗迹外，廓然大公已经看不出什么影子了。

(参考编号：AC9.A.25)



俯瞰九龙半岛，1870 年代。  
香港华芳照相馆

1842 年清廷被迫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英国割占了香港岛，1860 年清廷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再次战败，又被迫与英国签订另一不平等的《北京条约》，英国割占了九龙界限街以南。从这张由香港岛拍摄的照片可见当年九龙的建筑物还是非常的疏落。

(参考编号：P.22)



慈禧太后，1903-1904 年。  
勋龄摄

慈禧太后在 1903 至 1904 年之间由勋龄拍摄了 70 多张照片，大都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勋龄的父亲曾任清驻法公使，勋龄在法国接受教育。

勋龄的妹妹是当时担任慈禧太后御前女官的德龄，她后来将部分慈禧太后照片的底片带到了美国，最终入藏弗利尔美术馆。因此除了当年赏赐给外国使臣的照片，收藏市场上几乎没有直接由底片洗印的版本流通。

(参考编号：GC18.P.1)



恭亲王奕訢，1860 年。

比托摄

1860 年英法联军兵临北京时，咸丰皇帝离京往热河「北狩」，命自己的异母弟恭亲王奕訢坐镇北京主持和英法联军的交涉。

奕訢代表清政府于 1860 年 10 月 24 日与英国签署不平等的《北京条约》，中国丧失更多权益。11 月 2 日，奕訢回访英国统帅额尔金，英国随军摄影师比托抓住机会为他拍摄了两张肖像，此为其一。当年奕訢 27 岁。

奕訢其后主持新开设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军机处，成为中国内政外交的重要人物。

(参考编号：AC1.31)



醇亲王奕譞，1880 年代。

梁时泰摄

醇亲王奕譞是咸丰皇帝的异母弟。他的哥哥恭亲王原主持军机处，在中法战争失利后，被慈禧太后斥退，于是奕譞被推到前台，开始执掌国家军政大权。

1885 年，奕譞主持了新成立的总理海军事务衙门，为推动北洋水师的成军做出了贡献。同治皇帝逝世后，奕譞子载湉被指定继承大统，即光绪皇帝；光绪皇帝逝世后，奕譞的孙子溥仪又被指定为皇帝，即宣统帝，奕譞的后人中先后出了两位皇帝。

(参考编号：AC9.A.40)



庆亲王奕劻，1900 年。  
利卡尔顿摄

奕劻是不入八分辅国公爱新觉罗·绵性长子。他在醇亲王奕譞和恭亲王奕訢相继离世后成为掌管外交、军事的重臣，集内外大权于一身，并参与了不平等的《辛丑条约》谈判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

(参考编号：1016.1)



李鸿章，1870 年代。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他从编练淮军与太平军作战起家，到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一路上几乎参与了中国近代史上所有的外交事件，还一手打造了曾经位列亚洲第一海军的北洋水师，推动开办了中国近代的第一家银行，第一座现代化兵工厂等等。

(参考编号：AC8.A.46)



恭亲王奕訢，1871 年。  
汤姆逊摄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恭亲王奕訢代表清政府与英法联军谈判及签订不平等的《北京条约》。受此重创后，奕訢极力主张中国要自强，成为洋务运动的重要推手。在他的支持下，清政府创办了第一批近代军事工厂，编练了第一支近代陆军，开办了第一所训练外语人才的近代学校，派遣了第一个官员出洋考察团，以及第一个外交使团等。拍摄此照时，恭亲王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主理人，此为推动洋务运动的重要机构。

(参考编号：AC10.1)





总理衙门牌楼，1870 年代。  
查尔德摄

在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利后，清政府为解决各种棘手的外交问题而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虽然这个部门建立的初衷是为了解决与外交有关的问题，但在后来的运作中实际扮演了推动清政府进行洋务运动，使中国逐渐与世界靠拢的角色。总理衙门设在北京的东堂子胡同，照片中是其第一进院内的牌楼，上题出自《汉书》的「中外禔福」四字，取国内外一片安宁祥和之意。

(参考编号：AC56.22)



斌椿考察团主要成员合影，1866 年。  
巴黎巴雅德和博涛照相馆

1866 年，担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准备回国休假，他向恭亲王奕訢建议可以带一名清廷代表前往欧洲游历，记录见闻。总理衙门同意了这一计划，由赫德的中文秘书斌椿带队，并选带同文馆的英文学生德明和凤仪，以及法文馆的彦慧，其他成员还有斌椿的儿子广英。

考察团于 1866 年 3 月出发，8 月回国，游历了十几个欧洲国家，期间还拜访了英国维多利亚女皇及瑞典国王等。这是团员在法国巴黎的合影，前排左起为凤仪、广英、斌椿、德明、彦慧，后排为大清海关的外籍人员，左起为德善、包腊和美理登。此行是清政府首次派员出洋考察。

(参考编号：1006-PAG47.S.1)



蒲安臣使团主要成员合影，1868年。  
布莱迪摄

相片所示为清政府向西方派遣的第一个外交使团，由当时刚卸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前排中)率领，成员有总理衙门章京孙家穀(前排左一)和志刚(前排左三)、法籍海关税务人员德善(后排左一)、英国驻华使馆翻译柏卓安(后排左二)。

使团于1868年2月出发，1870年10月回国，访问了共11个欧美国家，期间拜访了英国维多利亚女皇、法皇拿破仑三世、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等。使团除相片所示的人员外，还包括了同文馆的学生等。

蒲安臣于1870年2月停留俄罗斯期间病故，使团改由志刚率领。这是清政府向外派遣的第一个外交使团，标志着清政府向国际社会及西方式外交踏出了第一步。

(参考编号：220-CC.S.40.1)



第一批留美幼童合影，1872年。

1854年在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的容闳建议清政府选派幼童去美国留学，这一建议得到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支持。经过选拔，从1872至1875年，先后有四批共120名幼童被送往美国学习，他们平均年龄约12、13岁，七成是广东籍，其中很多人回国后成为外交、教育、海军、矿业、铁路等方面的人才。铁路专家詹天佑、外交官梁敦彦也是第一批留美幼童，那时他们分别为12及15岁。

(参考编号：989-PAG30.S.1)



戈鲲化，1879 年。

1879 年，在大清海关任职的美国人杜德维建议哈佛大学聘请在英国驻宁波领事馆内担任翻译和中文教师的戈鲲化作该校的中文教师。戈鲲化擅于作诗，因此他在哈佛大学开设的课程也是围绕着中国的诗歌，还专门编制了一本中文教材《华质英文》。不幸的是他在美国执教两年多后感染肺炎病故。以戈鲲化捐赠给哈佛大学的藏书为基础，逐渐发展为美国的汉学研究重镇燕京图书馆。

(参考编号：199-CC.S.1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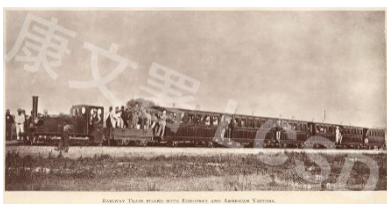


南京金陵机器制造局的工厂，1871 年。

汤姆逊摄

清政府在 1861 年至 1890 年代推行洋务运动，希望借西法以自强，而现代武器的生产是重中之重。李鸿章在组织淮军与太平军战斗期间就深深感受到西式武器的威力，因此他在 1862 年于上海筹建了「上海洋炮局」，主要由外国人管理生产枪炮弹药。1865 年已经升任两江总督的李鸿章又将洋炮局的主要工作人员迁往南京，合并沪、苏一带的兵工厂成立了「金陵机器制造局」，除了生产子弹和炮弹，还仿制当时欧洲最先进的后膛炮和机关炮等。

(参考编号：A12.A.32.3)



吴淞铁路通车，1876 年。

桑德斯摄

相片所示是在中国修筑的第一条铁路，吴淞铁路通车时在沪外国侨民试乘的情景。原本应该装煤的车厢也站满了人，后面还挂载了至少六节车厢。不过吴淞铁路的运营只维持了年余，清政府因为这条铁路的修建没有获得批准而将其收购，随后将其拆除。

(参考编号：1202-SHA67.A.5)



试航中的「德爾塔」炮艦，1876 年。

1875 年，正在筹建北洋水师的李鸿章接受大清总税务司赫德的建议，从英国订购两艘当时称为「伦道尔」艇的小型炮艇，排水量小却配有一门口径很大的火炮，1876 年交付予中国。这两艘船在英国船厂临时命名为「阿尔法」和「德爾塔」，经中方接收后，由李鸿章命名为「龙骧」号和「虎威」号。照片所示为尚在英国试航的「德爾塔」号。

(参考编号：1494-LC267.S.1)



在 1867 年法国巴黎世博会亮相的中国女性，1867 年。  
巴黎博涛照相馆

第一届世博会于 1851 年在伦敦举行，直至 1876 年美国费城世博会前，中国官方虽无参展，但那时世博会已有中国人的身影，亦有中国商人及民间参与，展出中国商品。好像 1867 年法国巴黎举行第四届世博会，清政府婉拒了法国的邀请而无参展，但有一位法国汉学家德理文自动请缨承担中国馆的筹备工作，并委托在大清海关工作的法国人美理登组织了包括三名茶女在内的民间代表团参加，于场馆开设了一家临时的茶馆，在巴黎引起了轰动。相片里的两位妇女即为当时来自福建，表演茶艺的茶女，此为她们盛装在巴黎影楼的留影。

(参考编号：343-CDV.S.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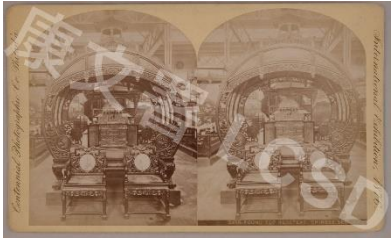
1876 年美国费城世博会中国展区，1876 年。  
美国百年摄影公司

1876 年，清政府首次派出中国官员出席美国费城世博会，参展商品共装了 720 箱。

相片所示为中国展区，木质大牌楼上书有「大清国」三字。展区的布置极具中国特色，展柜亦仿庙宇式的建筑，展示来自各省的物品，包括绸缎、象牙雕刻、瓷器、漆器、茶叶等。

是次世博会期间，正在美国留学的百多名中国幼童也在老师的带领下到场参观，并与中国官员李圭进行了交谈。

(参考编号：SC8.7.1)



1876 年美国费城世博会中国展区，1876 年。  
美国百年摄影公司

相片所示有圆拱顶的月床是中国展区极受赞赏的展品之一，于宁波生产，上附大量精美雕刻，并镶嵌象牙。此床在世博期间已售出，现为美国迪美博物馆藏品。

(参考编号：SC8.6.1)



1878 年法国巴黎世博会中国馆，1878 年。  
图廷摄

1878 年的法国世博会，中国官方也有参展。相较于 1876 年的美国费城世博会，这次中国自建了独立的展馆，不再与其他国家共用一展厅。相片所示为当时的中国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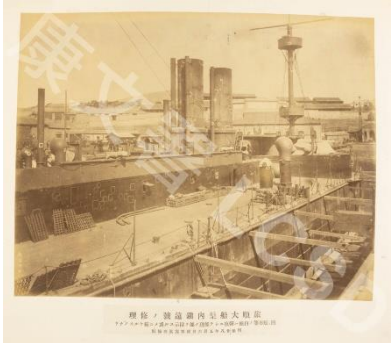
(参考编号：MC4.3)



1878 年法国巴黎世博会中国馆，1878 年。  
图廷摄

相片所示为中国馆内的陈设，装潢极具中国色彩，陈列的物品琳琅满目，有瓷器、珐琅器及宫灯等。馆内亦设有贩卖所，货品以瓷器、茶叶、古铜器、雕刻、象牙折扇为多。

(参考编号：MC4.11)



停靠在旅顺港船坞内的「镇远」号，1895 年。  
日本从军写真班摄

「镇远」号铁甲舰是北洋水师两艘主力战舰之一，1880 年向德国订制，1885 年交付中国，是当时亚洲第一的战舰。

1894 年，日本借口朝鲜问题，向中国挑起战争，史称「甲午战争」。「镇远」号在甲午战争中曾击伤日本舰队旗舰「松岛」号，迫使其退出战斗。但是在 1894 年 11 月 14 日进港时，「镇远」号船身多处擦伤，管带林泰曾引咎自杀。之后日军将「镇远」掳去编入其舰队。

照片中的「镇远」被日军拖至旅顺船坞，正准备修理，船身上用粉笔标注出来的位置是被弹片击中需要修理的地方。

(参考编号：984.12)

停靠在旅顺港船坞内的「镇远」号，1895年。

日本从军写真班摄



照片所示是停靠在旅顺港内的「镇远」号铁甲舰，其船头设有尖锐而强壮的撞角。19世纪是重视撞击的海军战术年代，这样的设计代表着一流的战斗力。在船首两侧靠近船舷处，有代表中国的双龙图案。「镇远」号在舰首、舰尾及两舷皆设炮。对比侧舷站着的两个人可知这艘铁甲舰的体量有多大。

(参考编号：984.13)

自沉的「定远」号，1895年。

日本从军写真班摄



「定远」号是北洋水师的旗舰，由清廷向德国订造，当时被誉为「遍地球第一等之铁甲舰」，威力冠绝东亚。此舰在1886年曾停泊于日本长崎进行保养，日本人目睹后亦被之震慑。然而，在甲午战争中，「定远」号被日军鱼雷舰击伤，后又搁浅，管带刘步蟾下令炸毁「定远」后自杀。照片显示的是已被破坏搁浅的「定远」号。

(参考编号：984.40)

旅顺鱼雷仓库内景，1895年。

日本从军写真班摄



清政府从德国订制「定远」号、「镇远」号两艘铁甲舰的同时，还从德国买回了当时最先进型号的鱼雷艇，每舰配两艘。鱼雷头部平时与雷身分开储存，待装舰时才会组装。

(参考编号：984.10)



刘公岛海军公所，1895 年。

刘公岛位于威海卫海湾，扼守海口，位置险要。在北洋水师成军后，清政府将水师的指挥部，即海军公所设置在刘公岛上。但是在甲午战争中，日军从陆路夺取了威海卫的岸上炮台，最终占领了刘公岛。

(参考编号：983.A.10)



丁汝昌花园遗迹，1895 年。

随着海军公所设在刘公岛上，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也带着家眷把家安在岛上，位置在公所不远的一处山坡上。此处居所有花园、水池、假山，水池两侧各建一座亭。这些景观在威海卫失守后都遭到日军的破坏，正如照片里的那样：池中的假山已被推倒，一片荒草漫漫。

(参考编号：983.A.14)



被日军破坏的炮台，1895 年。

日本从军写真班摄

威海卫的港口有刘公岛扼守，但最大的弱点就在港口后边的岸上，控制了岸上的制高点就控制了全港，因此清军在附近的山上修筑了多座炮台，并从德国引进了新式的岸防炮。讽刺的是，日军攻打威海卫的战略就是控制陆路，占领岸防炮台，对大部分火炮进行了破坏，一如照片中的炮台那样，将剩余的火炮对准港湾中的北洋水师军舰，进行轰击，使北洋舰队陷于日军海陆的包围。

清政府于甲午战争中失利，被迫与日本于 1895 年签订《马关条约》。此为日本被迫与日本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就中国的割地面积与赔款数量，大大超出了以前清政府与其他国家所签的任何一个不平等条约，日本由此获得巨大利益，令其进一步侵华的野心更为膨胀。

(参考编号：984.32)



李鸿章等人在俄罗斯，1896 年。

1896 年，为庆祝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清政府派出以李鸿章为首的外交使团参加典礼。使团在俄罗斯停留了一个多月后，又前往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美国及加拿大游历，约半年才回国。那年，李鸿章已 74 岁，西方报章称李鸿章带了一口棺材随行，以备万一。这张照片是使团在莫斯科期间的合影，坐者是李鸿章，他右边是他的嗣子李经方，左边是他的儿子李经述。

(参考编号：943-MS31.1)



李鸿章肖像，1896 年。

巴黎夏洛特照相馆

1896 年，李鸿章一行完成俄国的外交任务后前往欧洲游历，这张照片是李鸿章在法国拍摄。如果仔细观看，他的左眼要比右眼小，原因是 1895 年他代表清政府赴日进行《马关条约》谈判期间，在街头被日本人小山丰太郎开枪击伤左脸。虽然这一枪没有危及李鸿章的性命，但有弹片太靠近眼睛而无法取出，对李鸿章眼睛的外观产生了一些影响。

(参考编号：MC7.1.1)



烟台的外国传教士，1890 年代。

天主教在向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发生过不止一次文化和习俗上的冲突，明代(1368-1644)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为打破传教的障碍，主动改易中国人的服装，并接近知识分子群体，进而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正如照片中所示，这些在烟台生活的传教士也是穿着传统的中国服饰装扮，男子甚至还蓄发留辫。

(参考编号：AC25.A.1)



被烧毁的东交民巷使馆区，1900 年。

普莱桑特摄

自不平等的《北京条约》规定外国人可以在北京久居之后，东交民巷就逐渐形成了外国人的聚居区，这里不仅集中了多国的使馆，还有很多为外国人服务的设施，如百货公司、餐厅、



	<p>医院、俱乐部等等，在庚子事变中这里成为义和团重点进攻的对象。义和团是中国被列强不断压迫，以及民众与教会冲突频生背景下而发展起来，以「灭洋」为口号的组织。</p> <p>当东交民巷区域被攻击时，使馆的外交人员都躲进了英国使馆，其他大部分国家的使馆建筑被烧毁，从这张于热气球上俯拍的照片看，就一目了然。</p> <p>(参考编号：GC11.A.3.1)</p>
	<p>北京翰林院敬一亭，1900年。 凯利牧师摄</p> <p>清末翰林院与英国使馆仅一墙之隔。1900年，义和团将火种抛入翰林院内，试图引发大火让其蔓延到英国领事馆。使馆内的外国人及时发现并扑灭了这场大火，但这样的灾难仍然导致保存在翰林院的数百册《永乐大典》的唯一副本几乎丧失殆尽。</p> <p>(参考编号：AC37.14)</p>
	<p>逃离天津，1900年。 利卡尔顿摄</p> <p>因应义和团仇洋反教的运动，以及慈禧太后于1900年6月以光绪帝的名义向列强宣战，英、美、法、德、日、俄、意、奥八国组成联军，入侵中国。</p> <p>天津的清军对八国联军的入侵进行了坚决的抵抗，战事蔓延，引起居民的恐慌，富商们纷纷逃离。照片中乘坐轿子是正在逃离这座城市的人，据摄影师利卡尔顿观察坐轿者极可能是位大人物，走在前面的仆役还举着白旗。</p> <p>(参考编号：1133.S.11.1)</p>



天津逃难的教民，1900 年。

利卡尔顿摄

义和团的主要攻击目标除了外国人，还有信教的教民。面对八国联军的围攻，天津城内的义和团进一步加紧了对教民的迫害，因此很多人逃往租界区，从那里乘船投奔他处。

(参考编号：SC5.49.1)



河流里漂浮的尸体，天津，1900 年。

利卡尔顿摄

相片所示为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后，在河里漂浮的尸体。据摄影师的描述，每天都有大量的尸体和残肢漂向河的下游，多数都是被联军残杀的百姓，也有被义和团杀害的教民。岸上的建筑属法租界，在激战中已经被打得千疮百孔。

(参考编号：SC6.S.4)



被八国联军占领的天津，1900 年。

利卡尔顿摄

八国联军攻入天津后，天津被割分成不同的区域，由不同的国家管理，照片中可见天津城内火光四起，欲离开的民众坐在地上，正等待法国士兵放行，据摄影师所述，民众带着金银细软逃难，他们的很多财物都被掠夺，他们不敢抗议，也无法抗议。

(参考编号：SC5.61.1)



被八国联军摧毁的天津，1900 年。

利卡尔顿摄

照片中的这条道路曾经是天津城的南北轴线，是这座城市最重要的道路之一。但经历了战争的这条街道繁华不再，留下的只有断壁残垣和满目疮痍。远处略高的建筑是鼓楼，也是这座城市中心的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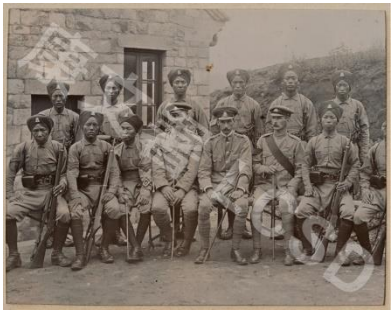
(参考编号：SC5.62.1)



俄军拆毁民宅，1900年。  
利卡尔顿摄

俄军在占领天津后，仍然以搜索义和团的名义在城中及周边劫掠，并且野蛮地将居民的住所拆除甚至放火焚烧。

(参考编号：SC6.S.37)



威海卫中国人军团，1900年代。

英国在1898年强租威海卫后，在当地招募中国青年组建了威海卫中国人军团，按照英国本土军队的标准装备和训练他们。除了中国人的面孔，他们军装上最大的特点就是印度式缠头，并且在缠头上别有一枚特制的徽章。

(参考编号：1131.64)



崇文门的钥匙，1900年。  
凯利牧师摄

照片中的这名美国士兵拿着开启崇文门的钥匙，长两尺多。

(参考编号：AC37.35)



日军占领的西华门，1900年。

八国联军侵华时，各国在攻打北京城前，已商量好哪国攻打哪座城门，但各国实际上都各怀鬼胎，战斗开始的那天晚上，有的军队提前发起了攻击，有的则临时改变进攻目标，因此各国军队攻入北京城的时间也不一样，开始抢劫的时间点也不一样。列强为了达成从中国所获利益的平衡，最后商定各国军队不进入紫禁城抢劫，并由美军负责把守午门，日军负责把守其他三座门。这张照片即日军把守的西华门。

(参考编号：AC44.10)



瓦德西参观紫禁城，1900 年。

利卡尔顿摄

尽管列强各国推举德国元帅瓦德西为联军统帅，但实际上直到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城之后瓦德西才姗姗来京。在欢迎仪式结束后，瓦德西在联军各国主要军官的陪同下参观了紫禁城，照片所示是参观的队伍正通过午门前广场。

(参考编号：1133.S.2.1)



荒芜的紫禁城，1900 年。

利卡尔顿摄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清皇室「西狩」导致紫禁城的内部第一次展现在世人面前，但是，第一次进入紫禁城的摄影师利卡尔顿却非常失望，他在日记中写道：「院子里的野草长得非常茂盛，整个院子里的草够一群山羊吃的了。金水河里也没有水了，灌木从墙上的缝隙中长出来。」

(参考编号：SC5.81.1)



李鸿章在天津寓所，1900 年。

利卡尔顿摄

拍摄此照时，八国联军已攻陷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帝亦逃出京城，原在广州的李鸿章受命北上与联军谈判，但他一路延宕，一方面他年事已高，另一方面也为了能观望形势，以获得更多授权。回到天津后他接待了很多前来拜访的外国人，这张照片是接见美国访问团时拍摄的。

(参考编号：SC5.67.1)





日本侵略军正通过正阳桥牌楼，1937年。  
大阪每日新闻社

这张照片和上一张的拍摄角度、拍摄位置非常接近。相比之下，虽然正阳门箭楼和正阳桥牌楼的匾额已经修复，但却有相类的氛围：日本侵略军正从这里进城，开始了对北京长达八年的占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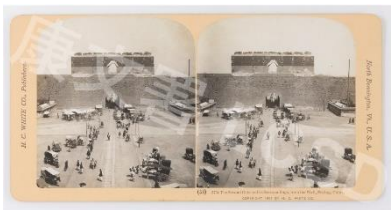
(参考编号：1141.3)



正阳门城楼，1870年代。

正阳门城楼自明正统四年(1439)完工后，一直是北京城的门面。因为位于皇城的正前方，故又被称为「前门」。作为北京内城的正门，其规模居北京各城门之首。

(参考编号：AC9.A.9)



被烧毁的正阳门城楼残迹，1901年。  
怀特摄

正阳门城楼在明代(1368-1644)落成后虽然遭受数次劫难，但都进行了重建，最后一次被毁是1900年八国联军入京后，几名英军下属的印度士兵在正阳门城楼内烧火做饭时引燃了城楼。对比上一张同一角度同一位置拍摄的正阳门，城台上只剩下光秃秃的基座，瓮城内本来热闹的摊贩也都消失不见。

(参考编号：SC21.52)



重建后的正阳门城楼，1900年代。

正阳门城楼被英军烧毁时正值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城期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都还没有返京，因此重建城楼的计划直到1903年才提出。但当时工部保存的工程档案已被毁，因此重建的城楼参考了崇文门的样式。

(参考编号：905.1)



战火后的西什库教堂，1900 年代。

为了躲避义和团，北京的华人教民大都躲到了位于西安门内的西什库教堂内。义和团和清军将教堂团团围住，不断枪击和炮击，教堂内仅有约 40 名法国和意大利的士兵作抵抗。历经月余的围攻与围困，义和团和清军始终没能攻下这座教堂。从照片可见西什库教堂的正立面遍布弹痕，花窗被打坏了，屋顶的十字架也歪斜了。

(参考编号：1024.200)



重建后的西什库教堂，1902 年。

不平等的《辛丑条约》签订后，天主教会用清政府的赔款对西什库教堂进行了修复，不仅重建了门口的两座碑亭，而教堂的正立面在维持原风格的基础上除了重建，还将钟楼从两层改为三层，即这张照片中的样子。

(参考编号：1047.12)



火车驶进北京城，1901 年。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城后，决定建设正阳门东站。要将铁路线延伸到前门，就要穿过城墙，于是英军将崇文门瓮城东西两边各拆掉一段城墙，形成两个豁口方便施工的火车通行，就像这张照片里的那样，待车站和铁路建设完成后，又将这两个豁口改为券洞。

(参考编号：GC11.A.46.2.1)



前进中的俄国军队，1904 年。

日本及俄国为了争夺在中国的利益，于 1904 至 1905 年在中国的土地上开战，但清政府却无力阻拦，只能默默旁观。相片所示为一队俄军正沿着东清铁路前往阵地。

(参考编号：1015.S.20)

	<p>在堑壕内准备冲锋的日军士兵，1904 年。</p> <p>日俄战争期间，双方在沙河附近准备展开争夺沈阳的战役，这片地带是非常开阔的平原，因此双方都修建了大量的堑壕。经过两周血腥的战斗，日军获得了胜利。</p> <p>(参考编号：1015.S.28.1)</p>
	<p>日军在沈阳，1905 年。 怀特摄</p> <p>照片所示是旅顺战役前，日军运送辎重的队伍正通过沈阳的钟楼。</p> <p>(参考编号：1135.S.33.1)</p>
	<p>日军炮击守卫旅顺港的俄军，1905 年。</p> <p>旅顺是日俄战争中双方的必争之地，而控制旅顺港的制高点是港口西北方向的 203 高地，为了夺取这一战略要地，日本方面组建了专门的军队进攻。日军最终攻下高地，继而攻下旅顺。这张照片是正在向旅顺港内俄国军舰倾泻炮弹的日军。</p> <p>(参考编号：1015.S.14)</p>
	<p>俄国战俘在日本，1905 年。 怀特摄</p> <p>为塑造「文明日本」的形象，日俄战争时，日本参照了国际法有关战俘待遇的规定，而制定了相关的法规制度，例如根据俄国战俘的军阶给予不同的粮食待遇。相片所示为当时的俄国战俘。</p> <p>(参考编号：1135.S.5.1)</p>





正太铁路通车，1907年。

为了输出山西的煤铁等资源，1896年山西巡抚胡聘之向清廷提出请求修建一条从太原到正定的铁路，但有官民反对修建铁路。这条铁路最终在1904年才开工，1907年竣工，这是通车时的石家庄站。

(参考编号：AC27.2)



修理火车头的中国工人，1900年代。

虽然正太铁路是法国工程师负责测绘和设计的，但这条铁路的修建也为中国培养了一批相关的技术人员。从这张照片中可以看出这样的修理工作需要很多人同时参与，除了一名法国工程师外，其余都是中国人。

(参考编号：AC27.13)



新军军官视察演习，1900年代。

清政府在经历甲午战争的失败后决定编练新军，由广西按察使胡燏棻在天津马厂成立了定武军，其后交由袁世凯督练。袁世凯仿照德、日陆军操典条令，对定武军进行改编，并装备欧洲的新式武器，定名为新建陆军。用先进的制度和科学的方法训练出的这支部队有着旧式军队没有的战斗力的，进入民国后成为北洋军队的主力。照片所示是1905年军事演习时的军官。

(参考编号：905.108)



演习中的新军士兵，1900年代。

从这张照片中能看到新军普通士兵的装备：他们装备的步枪是德国制的毛瑟步枪，身上的装具也学习自德军，背包上绕着卷起来的毛毯，上部挂着饭盒，背包两边还有一双皮靴，腰带上除了挂有弹药包外，还挂着水壶，背包插着一把工兵铲。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辫子，都盘起来塞在了帽子下边。

(参考编号：905.86)



处置鼠疫，1911 年。

1910 年底，东北地区爆发鼠疫，其源头是受雇于俄罗斯商人捕获旱獭的中国猎人。最初人们不知道蔓延如此之快又非常致命的是什么传染病，中国聘请了陆军军医学堂的副监督伍连德博士进行调查及防治工作。伍博士是马来西亚出生的中国医生，他根据病人的症状和生活环境判断出这种病毒是通过飞沫传染，定名其为「肺鼠疫病毒」，并通过隔离治疗的方法阻断了疫情的进一步传播，照片中有严密保护下的人员在现场处理疫情。

(参考编号：AC24.229)



临时隔离病院，1911 年。

伍连德博士在确认东北鼠疫是依靠飞沫传染的肺鼠疫病毒后，提出的策略主要就是检疫、收治与隔离，征用了一些学校、工厂厂房、火车车厢作为收治病患的临时医院和隔离病房，照片中是被征用的滨江(今哈尔滨)官立女子两等小学堂。

(参考编号：GC24.P.4)



病房，1911 年。

相片所示为医护人员在巡视病房。

(参考编号：GC24.P.19)



医院的女隔离房，1911 年。

这张照片显示了女隔离房。病人所带的口罩是由伍连德博士发明，其特点是在两层纱布中间放置吸水药棉，采用挂耳的方式遮挡住口鼻。这种口罩不仅可以有效防止飞沫传染，而且制作方便，价格低廉，当时被称为「伍氏口罩」。

(参考编号：GC24.P.17)



收治病患，1911 年。

照片中这座「养病院」很明显是座临时征用的商铺，两名役夫正用担架抬着病患离开养病院，这两个人看似严格遵守了防疫规定，不仅穿着专用的外套，而且也正确佩戴了口罩。

(参考编号：GC24.P.8)



光绪皇帝的出殡队伍，1909 年。

1908 年 11 月 14 日，光绪皇帝驾崩。彼时他的陵寝还没有建好，只能先送往清西陵暂厝。1909 年 3 月 12 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出殡仪式。围观的百姓人山人海，但是从这张照片看，路另一侧负责维持秩序的新军都下跪了，但是路这边的百姓却有很多人没有下跪，在下跪的人中还有半跪的，虽然这与我们了解的清代礼制有很大差别，但也确实反映出当时清政府中央集权的衰落。

(参考编号：AC2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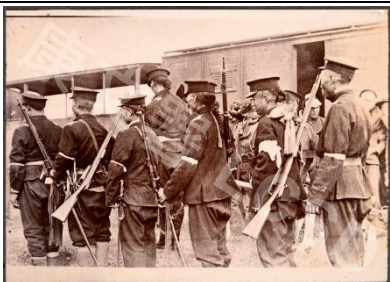


湖广总督瑞澂与湖北新军军官合影，1900 年代。

在清廷关于编练新军的号召下，湖广总督张之洞将湖北境内的旧式军队改编为湖北常备军。1907 年新军军制确定后，依新军编制再行改编，分别由张彪和黎元洪统帅。

这张照片是瑞澂在湖广总督任上与湖北新军主要军官的合影，前排右六是瑞澂，右七是他的儿子，右四是张彪，右三是黎元洪。

(参考编号：AC51.31)



臂缠白巾的起义军，1911 年。

丁乐梅摄

1911 年 10 月 10 日的武昌起义为辛亥革命揭开序幕。当时并无起义军的制服，他们相约臂缠白巾，以作识别，就如相片所示那样。

	(参考编号：1994-899.4)
	<p>观战的百姓，1911年。</p> <p>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打响后，起义军先占领了楚望台军械所，然后带着缴获的武器围攻湖广总督府，很多百姓闻讯赶往高处观战。</p> <p>(参考编号：AC49.1)</p>
	<p>鄂军都督府，1911年。</p> <p>武昌起义胜利，武昌起义党人在原来的湖北省咨议局大楼成立鄂军都督府(湖北军政府)，推举黎元洪为都督。照片中正是已经改换旗帜的鄂军都督府大门。商贩们已经开始在大门前摆设摊位，似乎恢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现在这里已经成为辛亥革命博物院。</p> <p>(参考编号：AC49.19)</p>
	<p>北京街头挂起五色旗，1912年。</p> <p>辛亥革命成功后，民国肇建。1912年4月，临时政府迁至北京，经临时参议院表决，自上而下按红、黄、蓝、白、黑顺序排列的五色旗被定为中华民国国旗。照片中北京的前门大街悬挂了中华民国的国旗。</p> <p>(参考编号：1027.89)</p>